在可预见的较长一段时间内，高文谦的这本书，都将是周恩来文革岁月的研究中，对一些关键历史事件的解读，仅有的史料。而究竟有多少事实还未被揭露，或者说又有多少真相有待查验，大概都要等到新朝雅正之际了。作者在行文中，对人物内心想法，确实不免存在着主观臆断或者缺少直接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但逻辑上显然还是通顺的，而反对者们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大体还是可信的。

虽然本书名义上的主角是周恩来，但和其在人生中绝大多数岁月里所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毛泽东巨大身影下的一名忠顺的臣子，其命运受到毛一举一动的巨大影响，因此毛泽东是这出大戏背后的主角。

毛、周的最后十年，也就是文革的十年，因而《晚年周恩来》也是梳理文革始末（当然，文革名义上的结束已在华国锋的时候了，不在本书的写作范围）极好的资料。全面细致的理清文革的脉络当然不是容易的事，但大致的关键节点还是可以明确。

文革最初的预定目标，是在政治上彻底清除刘少奇及其全部影响力，由于毛认定刘已在党内根深叶大，早已被树立为继承人多年，“名不正则言不顺”，非得要有足够响亮、“正当”的理由不可，同时非得要全面清理的方式才能肃清其势力，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文革的部署与开展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毛高超的政治斗争手段与鲜明的个人特色，是其后半生为人作风的全面展示。虚虚实实，以退为进，拉一打一，毛在文革开始之际，借用了当时早已存在于广大群众的对共产党官僚统治的不满，把自己塑造为民众的解放者，“走资派”官僚的对立面，放出红卫兵造反派，“天下大乱”，将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引向各地的政府，要打倒党内的“走资派”，最终的矛头所指即刘少奇。待到刘少奇已被打倒，造反派们又成了新的累赘，于是林彪的军队进驻，成立了某种意义上的军管政府，被利用完的造反派、红小将们又被抛到了一边，不是被关进了牢里，就是上山下乡，下放或者说流放到了农村，只有极少数人成为了“新干部”，占据了“老干部”们留下的生态位。

林彪是毛泽东开展文革的最大帮手，毛许诺以“接班人”的名头，还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但在打倒了刘之后，林彪发觉这不过是一个虚衔，毛只是利用自己，却并不像真的愿意在身后把权力交给自己。心怀不满，意有忿忿，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确有造反之打算，但也有心想与毛坦开心胸，沟通清楚。但毛却不肯见面，动了取代林彪继承人地位的念头。林彪当然不愿像刘少奇一样束手待毙，但毕竟手段远比不上手腕老练的毛，败下阵来，在仓皇中逃亡苏联，飞机失事殒命蒙古。两个昔日的盟友反目成仇，彻底闹翻，林彪固然死于非命，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文革在政治上彻底破了产，败局无可挽回，剩下的时间不过是困坐愁城，做无谓的苦斗罢了。

林彪没了，周恩来这时成了党内的二号人物，主持起了文革后期的恢复工作。毛此时早已疑神疑鬼，又准备要斗争周恩来，其高峰当然就是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并将原来被下放的邓小平搬出来分周的权。文革早已是死路一条，但却是毛最后的一大心结，其全部的政治生命已压在了这上面，不肯承认现实，不能让任何人否定文革，但矛盾的是，任何恢复国民经济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文革的反面，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主持工作，都是如此，邓小平又被打倒了。除了得势的造反派外，全国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恢复经济正常秩序，遭毛泽东迫害的周恩来的死，激发了人们悲痛，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四五运动”，毛深知大势已去，四面楚歌，忧病交加，几个月以后便一命呜呼。

晚年的毛不仅各种政治的手腕极其毒辣、炉火纯青，同时也疑心病极重，不仅把自己的盟友推向对面，还以极大的代价、百倍的力气痛打“死老虎”，完全不明白适可而止、掌握分寸。但也可以说明的是，毛的多疑不是没有来由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是由于毛的真正意图与玩弄权术见不得人，心里实际上暗暗意识到其罪行罄竹难书，却又妄想着青史留名，流芳千古，于是乎走向了极端，自己也走向了绝路，一次又一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需说明的是，毛的错误不仅是个人品质的问题，也是体制上的系统性的悲剧，列宁创立，斯大林最终缔造的这套体制，极大地放大领袖个人的恶。

周恩来算得上是个悲剧的英雄，英雄来自于其非凡的个人魅力、政治技巧与为国为民的初心，悲剧却不完完全全是外部的原因，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周自己。周始终没能走出“忠君”的桎梏，且是几乎毫无保留、始终如一的忠顺，相较之下，对毛的忠诚要在周的心目中摆在第一的位置，所谓“人民”只能往后了，愚忠甚矣！周恩来没有能力担当独当一面的领袖，不单是其缺乏大开大阖的气魄，也是周没有“独立之精神”。周恩来对自己的评价“事务主义作风”是极贴切的，许多事情他当然是能想明白搞清楚的，但却不愿想，甚至想了也不敢做什么。克己忍让，顾全大局，苦闷拼命地干，却始终搞不明白什么才是第一位的。于是在文革中，周恩来固然为挽救国家做了很多事,却也昧着良心，逢君之恶，制造了众多冤假错案。加之其出发点还是为了维护毛，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周恩来的这种双重角色，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所犯下的错误已然不可挽回，岂只是“晚节不保”可以言尽的吗。